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变迁时代的生命历程、人生转折与心理嬗变

作者：胡洁、周晓虹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随着 2018 年中国心理学会质性研究方法专委会的建立，质性研究方法在心理学中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其中，心理传记法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质性方法。现阶段质性专委会主编的辑刊即被命名为“心理传记与质性心理学”。然而到目前为止，心理学中使用心理传记法还只是针对个体开展研究，本研究将心理传记学的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集体口述史方法对于研究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或集体心态具有较高的适切性，不仅可用于研究历史杰出人物的个体生命史，也可用于研究具有年鉴史学意义的社会心态史。基于 40 位知青一代社会学家口述史的研究，资料足够丰富，研究者功力深厚，所得出来的结论，无论是个人生命历程还是集体心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嵌套，都足以令人信服，是一份兼具重要的社会学、心理学、史学价值的研究。

意见 1：

该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社会学色彩浓厚。不同学科在研究的问题、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上有不同的规则或特点。建议作者在各级标题和遣词等语言表述上再做些修改，强化心理学意味，使其更适合心理学研究者的阅读习惯。例如，副标题“——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或可改为：——“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口述史与集体叙事；“3 转型心理学，或变革时代的个体蜕变”或可改为：“转型或变革时代知青社会学家的心理蜕变”；“4 社会心态的表征，或知青社会学家的集体叙事”或可改为“知青社会学家集体叙事中的社会心态表征”，等。这些只是建议和讨论，旨在突出心理学研究的特征。相信作者会有更好的表达。其他建议见文中批注。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而中肯的意见与建议，以下是我们对问题的回答及修改或个别未修改的理由：

审稿专家指出了本研究社会学色彩浓厚，并建议作者在各级标题和遣词等语言表述上再做些修改，强化心理学意味，使其更适合心理学研究者的阅读习惯。这一建议非常合理，也是我们在写作时非常注意的出发点，但因为学科背景使然，纵然一再注意也难免落入旧巢。现在，我们已经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1）将副标题“——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改为：——“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口述史与集体叙事；（2）将“1 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精神的嬗变”改为：“1 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3）审稿专家建议将“3 转型心理学，或变革时代的个体蜕变”改为“转型或变革时代知青社会学家的心理蜕变”，因考虑到原先的标题突出了心理学尤其是个体蜕变的意义，以与下一节集体心态相对应，因此没有做变动，敬请谅解；（4）审稿专家建议“4 社会心态的表征，或知青社会学家的集体叙事”或可改为“知青社会学家集体叙事中的社会心态表征”，我们改为：“4 知青社会学家的集体叙事与社会心态表征”，以使一方面对应于前一节的“个体蜕变”，另一方面达到语言表述的平直。

意见 2:

由个体口述史到对集体叙事的研究,建议作者对研究方法加以补充说明,以突出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进展与贡献。另,该研究与《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7 期发表的《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使用的似乎是同一个样本,同一份访谈资料,即周晓虹教授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 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对于同一份资料的两种解读,其视角差异希望予以说明。

回应:

谢谢审稿专家的两个问题:(1)我们对第一个问题做了如下补充(见文中 1.2 口述史与集体记忆:心理史与心态史的互嵌),以说明口述史的研究及其方法:

口述史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事后通过口头叙述的历史,或者说“是通过记录访谈的形式,收集记忆和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的一种史学分支或历史研究方法”(里奇,2019: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口述历史的合法性在当代获得了承认,但在过往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一直因德国人兰克(Leopold von Ranke)倡导的实证史学对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文献资料的独宠而饱受歧视,被认为过于主观,并容易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曲解。不过,这种受历史学排斥的方法,很早就新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不但恩格斯在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材料,“在他们更为直接的政治著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的同时,也常常实质性地使用来自他们无以计数的通信者和访问者的书面和口头报告”(Thompson,2000,p.42);1859 年,《纽约论坛报》主编 Horace Greeley 通过对盐湖城摩门教教长 Brigham Young 的访谈,开创了新闻采访的先河;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民族志局(U.S.Bureau of Ethnography)的工作人员用简陋的蜡滚筒录音设备记录下美国土著的歌曲和故事,此后通过观察和采集口述资料描绘群体及其文化模式的方式开始盛行于被誉为口述史“堂兄弟”的民族志(ethnography)之中(Wheeler,2008)。

作为学科的口述史,被认为始于阿兰·内文斯(Allen Nevins)194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的口述历史研究室,但它在当代的流行,则一方面归因于由英国社会史学和法国年鉴史学派倡导的历史学转向,这一转向提倡“自下而上看历史”,对劳动者或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怀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归因于现代数字技术的进步和便捷。就前一个原因而言,如保尔·汤普逊所言:“口述史意味着多种历史的重心转移”(Thompson,2000,p.7);而就后一个原因而言,不仅最初的口述史学的流行有赖于 20 世纪音影设备和技术的进步,它使得从中国世代相传的说书人到现代社会学的田野访谈者所进行的类似工作有可能获得方便的记录,而且归因于“新的数字技术(也)正在改变我们记录、解释、分享和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由此引发了口述史学领域全新的范式革命(Thomson,2007)。

(2)我们对另一个问题则回复如下:

作者之一与学生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7 期上的论文——《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确实使用的是与本文相同的访谈资料(周晓虹教授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 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文章也长达近两万字;但是,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讨论的议题却与本文完全不同:如果说本文

着眼于从心理史学和心态史学的双重角度，讨论变迁时代社会学家个人和社会学家共同体发生的心理嬗变，那么，在《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一文中作者则欲图从学科史的角度，探讨他们的生命历程对其后来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实践的影响，如该文的摘要所说：

在 1979 年开始的社会学重建过程中，以“上山下乡”知青为主体的一代社会学家凭借改革开放的制度背景，成为社会学重建的主导力量。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年的知青（包括做工或从军）经历、在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学术机构的求学经历及出国留学或访学体验，赋予其鲜明的问题意识，也决定了其颇具特色的学术实践。作者以数十位“知青”社会学家的口述史料为叙事线索，讨论了个人生命史对社会学学科史及学术思想史的建构意义，并提出了“将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的基本主张。

其实，作者之一近期又完成了另一篇学术论文，讨论的是知青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在何种程度上锻造了他们的学术话语体系。作者在这几篇论文中，不仅讨论的主题不一样，而且还尽可能使用了不同的口述史资料，毕竟上述口述史资料正式出版的部分就达 110 万字，基本上成了一个小型史料库。

意见 3:

小标题“3.1 转型或变迁重构了知青社会学家认知世界的方式”中“认知世界的方式”与“3.3……知青社会学家的个人现代性”似有部分重叠。“个人现代性”是否包含“认识世界的方式”？“3.1”那里改成“认知结构的重塑”是否可行？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有益建议，为了回避上述可能发生重叠，作者采取了两个方法修改原有的表述：（1）作者接受审稿专家的意见，将原来的标题“3.1 转型或变迁重构了知青社会学家认知世界的方式”改为“3.1 转型或变迁重构了知青社会学家的认知结构”；（2）在 3.3 有关个人现代性的表述中，作者加了一句话，以说明除了现代认知和情感外，还包括其他方面的个人现代性：

伴随现代社会的变迁，人的心理也会出现明显的蜕变：除了如前所述具备现代认知和情感外，现代人还应是积极参与的公民、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乐于接受新挑战和新观念，而促成这种蜕变的因素包括教育、工厂体验、都市生活及大众媒介（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

意见 4:

建议在“讨论”之后增加“研究结论”。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原本我们觉得结论已经在摘要和讨论中有所提及，不必再度涉及，但审稿专家的建议让我们感觉到，如果在结尾处再凝练“研究结论”，对读者或同行理解论文将十分有益，因此我们：（1）将原先的标题：“5 讨论：大变迁时代的心理嬗变”改为：“5 讨论与结语：个人心理与集体心态的交织与嬗变”；（2）在论文最后增加了一个小节：“5.3 简短的结语：大变迁时代的心理嬗变”及以下文字：

通过 40 位社会学家尤其是其中近 30 位“知青社会学家”的口述史，我们分析了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第一代学人的集体记忆，并追溯了他们的个体心理和集体心态互为交织的双重嬗变过程。首先，沿侧重生命历程尤其是早年成长经历对成年后个人精神世界之影响的心理史学的路径，能够发现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 40 年中发生的林林总总的社会变迁，重构了知青社会学家的认知结构、情感世界和个人现代性；其次，沿侧重社会整体氛围对生活期间的群体成员精神建构之影响的心态史学的路径，则能够发现这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转型，左右了知青社会学家的学术生涯和话语叙事，无论是倡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富民实践，还是培养遂生乐业的心态秩序，再或是践行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都体现出或表征了知青一代社会学家在大转型时代的集体心态。最后，通过个体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互动、群体成员间的认同，以及与他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的共情（empathy），最终形成了知青社会学家群体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吻合的精神气质与普遍向上的社会心态。

意见 5:

其他商榷之处详见文中批注。

回应: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审稿专家还有一些小的意见或建议以批注的形式写在论文 word 版本上，我们对上述四方面的问题以外的小问题也一并回应如下：

(1) 主标题中用的是“心理嬗变”，摘要和文中很多地方用的是“心理蜕变”，不知作者对这两个词的使用是否有所考虑？

回应：在中文中，嬗变和蜕变两词的词义并无本质的区别，《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对“嬗变”的释义为：“更替，蜕变。”（第 1103 页）；而对“蜕变”的解释为：“（人或事物）发生质变”（第 1283 页）。不过，为了有所区别，在本文中我们将“蜕变”尽可能限于个体，如个体精神蜕变，而将嬗变用于群体或一般不做个体与群体区分时，如“心理嬗变”。

(2) 审稿专家建议将这句话“这使得生命历程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具有某种契合性（李强等，1999）”中的黑体部分改为“引入生命历程理论作为解释框架”。

回应：作者采取了审稿专家的建议，将这句话最终改为：“这使引入生命历程理论作为解释框架在中国具有某种契合性（李强等，1999）”。

(3) 审稿专家对“如果从认知方式的差异角度，我们可以将知青社会学家的重构或转变模式大致概括为：从一元到多元、从依赖到独立、从非此即彼到兼容并蓄、从耽于表面到追根溯源……”这句话的最后四个字提出疑义，建议将“追根溯源”改为“穷根问底”。

回应：在这里，作者的原意是在年轻时代，或改革开放前再或上大学前，知青社会学家的认知方式满足于表面的解释，但现在却会追究到事物或事情的本源或根子上。相比之下，“穷根问底”好像不如追根溯源更文雅、更符合原意，故修改时保留了先前的表述。

(4) 审稿专家建议将“4.1 集体叙事主题之一：现代化与富民实践”的标题，改为“4.1 集体叙事主题之一：经世济民的学术价值观”。

回应：单从文字的优雅或学理来说，这样改确实不错；但是，因为费孝通先生将自己的

一生归纳为“富民实践”，所以社会学界一般会将投身现代化视为“富民实践”的重要方式；加之我们在本节下文中论述到了“经世济民”：“社会学重建与改革开放同轨并行的历史，使得这一学科再生伊始，就踏上了万象更新的现代化征程，也使得 20 世纪初在中国萌生之时便提倡‘经世济民’的社会学再度对接进了服务国家的行列”。因此，这里不改为好。

(5) 审稿专家建议将“4.2 集体叙事主题之二：遂生乐业与心态秩序的调适”改为“4.2 集体叙事主题之二：遂生乐业的心态秩序”。

回应：这个建议非常好，使得意思的表达更加清晰，我们毫无条件的接受，并予以感谢！

(6) 审稿专家建议将“4.3 集体叙事主题之三：社会学的本土化”，改为“4.3 集体叙事主题之三：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回应：因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本节标题不宜改动：(1) 社会学重建只是一个事件，“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则是一个学理性的议题；(2) 基于此，只有在社会学重建的整数时间（如 10 周年，或 2019 年我们进行口述史时的 40 周年）一般才会讨论这一事件，但从 1930 年代开始，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就一直萦绕在中国社会学家甚至第二、第三世界的社会学家 1960 年代以后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中。

(7) 在讨论“5.1 个人心理与集体心态：蜕变与建构”时，审稿专家对“在讨论个体心理的蜕变与集体心态的建构关系之时”这段表述提出了意见：“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同时都是蜕变与建构”的主语，即个体心理也是建构的结果，而集体心态也经历了蜕变。”

回应：一般说来，审稿专家的上述意见是有道理的，这两者都有蜕变和建构的问题。我们原先认为，比较而言，集体心态比个人心理更富于建构的因素。不过，我们愿意采纳审稿专家的建议作出修改，其中一段改为：

在讨论个体心理和集体心态的蜕变与建构关系时，首先有必要对这两种精神现象的变化单独加以说明，以便在厘清各自的内涵和边界的前提下，再行讨论两者间的彼此镶嵌或相互建构过程。就个体心理而言，一如我们已经申明的那样，无论站在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立场，还是站在心理史学或心态史学的立场，人们都不否认单个个体的变化或建构有赖于他们生存其间的群体氛围或社会环境。

(8) 在讨论“5.2 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的互构”时，审稿专家建议标题改为：“个体心理向集体心态整合的方式：互动、认同与共情”。

回应：我们觉得一方面审稿专家的建议突出了互构的方式——互动、认同与共情，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审稿专家建议的标题似乎着眼于集体心态，但忽视了互构后的个体心理。因此，我们最后将标题改为：“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的互构：互动、认同与共情”。

.....

审稿人 2 意见：

本文极其艰巨地选择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性精英社会学家群体，对每位社会学者都进行了长时间的个人生命历程和学术成长的口述史访谈，以揭示中国社会从 1978 年以来的伟大转型和个人生命历程之间复杂的印刻过程。论文融会当代社会心理学有关集体记忆的前沿研究、心态史学研究和宏大社会变迁的社会理论研究，力图揭示精英社会学者群体的成长轨迹与宏大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模式。论文拓展了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议题，促进了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自觉。本文实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可喜的珍贵

成果。

意见 1:

审稿专家建议第 12 页的独立自我-互依自我可简化为独立我-互依我。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已经将这一对概念的中文表述简化。

意见 2:

英克尔斯的名作有更新的中文译本。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在本文中，我们援引的著述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和史密斯的名著《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英文为：**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s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该书最早在 1980 年代曾有一个简本，译为《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走向未来丛书”，殷陆君编著）。此外没有新的译本，因此书名无误。敬告，并谢谢审稿人的认真负责。

第二轮

编委意见:

本文原文篇幅较长，修改中作者根据外审意见又做了补充，使得全文篇幅达到了 2.6 万字之多，请作者尽量精减内容，精炼文字，压缩内容，突出核心。

回应:

因为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比较复杂，以及作者写作过程中参阅的文献比较多，第一稿确实长达 27 页（2.6 万字）之多。此次获得第二轮意见后，两位作者商量后决定对论文做一次比较彻底的“瘦身”，即使对原稿件及观点“舍不得”也绝不含糊。为此，第一作者先做了一次压缩，以突出核心内容，将原稿压到 22 页左右；接着，第二作者，也是通讯作者，又对论文做了第二次压缩。在压缩内容、突出核心的同时，进一步精炼文字，最后几乎到了字字斟酌的地步，终于将论文压到 18 页半（不含英文摘要），1.9 万余字。直到没有办法在不损害论文要义的前提下再进一步压缩为止。具体说来有这样一些修改或压缩：

1、在标题“1.2 口述史与集体记忆：心理史与心态史的互嵌”下的内容被精简压缩，具体有这样几段：

（1）开篇一段述及共同体与记忆的论述被整段删除：

在罗伯特·贝拉等人看来，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或我们所言的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记忆共同体”（communities of memory），而“在记忆共同体内长大的人，不仅听说过共同体如何形成、它的所思所虑以及它的理想如何通过那些卓越的男男女女所展现的故事，而且他们也投身到了将共同体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践中去”（Bellah et al., 1996）。我们曾一再说明，……

(2) 下面一段文字是在第一次修改后加上去的有关口述史的两段文字之一，考虑到文字过长，本次将下述相对联系不紧密的第一段文字去掉：

口述史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事后通过口头叙述的历史，或者说“是通过记录访谈的形式，收集记忆和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的一种史学分支或历史研究方法”（里奇，2019：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口述历史的合法性在当代获得了承认，但在过往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一直因德国人兰克（Leopold von Ranke）倡导的实证史学对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文献资料的独宠而饱受歧视，被认为过于主观，并容易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曲解。不过，这种受历史学排斥的方法，很早就新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获得广泛的运用：不但恩格斯在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材料，“在他们更为直接的政治著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的同时，也常常实质性地使用来自他们无以计数的通信者和访问者的书面和口头报告”（Thompson, 2000, p.42）；1859年，《纽约论坛报》主编 Horace Greeley 通过对盐湖城摩门教教长 Brigham Young 的访谈，开创了新闻采访的先河；19世纪90年代美国民族志局（U.S. Bureau of Ethnography）的工作人员用简陋的蜡滚筒录音设备记录下美国土著的歌曲和故事，此后通过观察和采集口述资料描绘群体及其文化模式的方式开始盛行于被誉为口述史“堂兄弟”的民族志（ethnography）之中（Wheeler, 2008）。

(3) 有关心理史学和心态史学的理论论述中，被精简了许多段落，其中最主要的有：

由此来看，如果说心态史学的创设意在改变传统史学“自上而下”的俯瞰视角，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史而非政治史；那么，心理史学则导源于新史学对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心理学研究手段的膜拜与借用，1958年威廉·朗格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时就毫不犹豫地表达：“迫切需要通过利用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和发现来加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Langer, 1958）。

比如，希特勒的暴虐与父亲在其儿时生活中“扮演的……暴徒角色”（兰格，2011）有关；无独有偶，斯大林儿时在父亲的拳脚下“挨打的记忆（也）转化成了决定这位未来统治者的关键心理因素”（Suny, 1991）；……

2、在标题2“知青”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事件、体验与“神话”一节中，也做了许多精简，其中主要有这样几段：

(1) 对曼海姆观点的精简，去掉下面一段：

而组成一个“现实代”（generation as actuality）：“而同一现实代中的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共同的经验，因此构成了不同的代单位（generational unit）”，一个确定的“代单位”最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它……

(2) 对知青社会学人的描述被去掉两段：

而在上述我们提及的那些事件中，一些事件是更大的政治事件或社会背景的一部分。比如，上山下乡的终止是“文革”结束的标志之一，而高考的重启和社会学的重建则标志着改革开放这一后来绵延40余年的历史事件的开启，而为社会学人津津乐道的南开班（彭华民口述，540；张龙，2021）则不过是社会学重建过程中的一段插曲。

前半生跌宕起伏的翻砂工赵鼎新，因为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支内’、‘文革’、改革开放等断崖式的重大事件”，所以会底气十足地向芝加哥大学以研究时间性见长的同事阿伯特（Andrew Abbott）“叫板”：“我对时间和时间性的感受与你很不相同”（赵鼎新口述，1048）。

(3) 有关1978年整体社会氛围的表述被去掉一段，以做到进一步简洁：

比如，1978年作家徐迟为全国科学大会造势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掀起

了以原先被贬为“臭老九”的科学家与知识分子为偶像的“追星热”——数学家陈景润不图享乐，甚至不谙事理，成为激励年轻一代献身“四化”的典范。

3、在标题3 转型心理学，或变革时代的个体蜕变一节中，所做的精简有：

(1) 有关第一、二代社会学人的文字：

同1949年前“大多出生于地主、官僚、商人等家庭”（阎明，2010）并留学英美的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第一代社会学人，及1949年后基本上自台港地区留学美国的金耀基、林南和李沛良等第二代社会学人相比，……

(2) 有关认知风格的具体介绍：

比如，分析性认知-整体性认知（Nisbett et al.,2001）、以规则为基础的思维-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和与此相关的形式推理-知觉推理（Norenzayan et al.,2002），及独立我-互依我（Markus & Kitayama,1991）。

(3) 有关知青学人在农村插队时的经历，以及对他们的一段评述：

同样的认知难题沈原也曾碰到，他1974年上调回城时，队长语重心长地托他：“你回北京了，那天遛弯时万一碰到毛主席，你千万替我问问他老人家，为啥老农民一辈子种地，一辈子吃不饱？”（沈原口述，630）

从蔡禾的事例中，你能够理解，为什么更年轻的一代一方面洞察到知青社会学家的“短板”，另一方面也坦陈“历史经历，给了他们特别开阔的视野，能够很快从小事件中捕捉大意义”（项飏，2015）。

(4) 有关情感研究的简述：

最早，亚里士多德将情感界定为“包括所有使人改变看法另作判断的情绪”（Aristotle,1959），在社会学家涂尔干、帕森斯之后，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通过微表情分析推动了情绪或情感研究（Ekman,1982），而我们前面一再提及的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受勒庞的影响，更是提出“情绪是会传染的”（Febvre,1973），由此将对情感的理解嵌入到主体间性之中。

(4) 有关知青社会学人个人现代性的三段文字：

为了推动这种变化，李培林在陆学艺支持下，不仅比较早地在国内使用了“社会转型”的概念，并且曾用六大转型描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的深刻的社会变迁，提出“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李培林口述，344）。

除了敏锐，还要有独立性和自主性，要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周雪光甚至将这种冒险精神一直追溯到他们的青年时代：“在农村的经历可能激发了知青对生活强烈的憧憬，鼓舞了他们在面对新的机遇时采取持之以恒、敢于冒险的态度”（Zhou & Hou,1999）。

最早在慕课平台上开设了观看量超过百万级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与信息科学学科的教授开设了“网络与社会”课程；

4、在标题4 知青社会学家的集体叙事与社会心态表征一节中，所做的精简主要有：

(1)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段介绍性文字：

会议不仅“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而且“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2010）。

(2) 一段说明当时社会氛围的文字：

在失去高考机遇十年之久后，七七、七八级进了大学；千百万人获得了“平反”或“摘帽”；下乡十年的“知青”回城了；像前述陈景润一样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无数“臭老九”获得了新生，并营造出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

(3) 其他还有多处删减：因为每一段都比较短，不再列出。

(4) 台湾地区社会学家叶启政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一段经典论述：

比如，叶启正曾提出：“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中国乃是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中的一个环节……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成长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亦步亦趋，因而形成了它的实证性格、实用性格、移植性格和加工性格”；而“单就民族情感与自尊的立场来看，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叶启政，1982）。

5、在标题 5 讨论与结语：个人心理与集体心态的交织与嬗变一节中，所做的精简主要有：

(1) 精简了有关埃尔德的一段论述：

如此，虽然埃尔德的生命历程理论更倾向于埃里克森的模式，但他还是通过将童年期与大萧条的不期而遇用于说明那一代人“都倾向于将大萧条作为自己行为的解释”（Elder,1999），依旧部分保留了弗洛伊德的存在。

(2) 精简了一段为说明社会氛围而引述的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费弗尔对法国大革命时的论述：

比如，历来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都着眼于繁华的巴黎街头，却忽视了乡间因匪患造成的“大恐慌”，但勒费弗尔却看到了这由人际间的网络形成的“集体幻想”导致“农民通过这一番瞎折腾，却也增加了团结感，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简单”（勒费弗尔，2019）。

(3) 康纳德对社会记忆（回忆）的一段论述：

此时如康纳顿所言，“每一次回忆，无论多么个人化，甚至只是我们自己目睹的事件，再或是尚未表达的思想和情感，都与其他人拥有的一整套观念相交织：与人、地点、日期、词汇、语言形式，也就是说与我们现在或曾经隶属的社会的全部物质和道德生活休戚相关”（Connerton,1989）。

(3) 删去了社会认同的具体过程：

(1) 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即划分“我群”和“他群”，在观念与行为主动靠近我群的同时，拉开与他群的差距；(2)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在与我群成员频繁进行比较的同时，逐步摒弃差异，形成共识；(3) 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通过这种区分，能够使我群成员的价值获得进一步的彰显（Tajfel,1982）。

6、本次修改，作者根据正文内容的调整，对中英文摘要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还删去了许多没有直接应用的参考文献。全部被删除的内容达到 7000-8000 字，目前已经基本上无法再有效精简。敬告，也谢谢评审专家的建议。

第三轮

编委意见：

作者将原稿由 27 页，2.6 万字，压缩到了 18 页半的 1.9 万多字，且保留了文章的核心

内容，文字更加精练。建议发表。

主编 1 意见：

该稿经过专家评审和作者修改，已经基本达到学报发表要求。但是，为了更好的符合心理学的论文写作和表述习惯，建议做少量文字修改和段落调整。建议把 1.1.和 1.2.的顺序互换一下，文字也做相应调整，这样先讲一般性的背景和方法，然后样本选取，再后接着就是主要结果，最后讨论和结论。从心理学的视角看，调整后的稿子将更符合心理学的逻辑。修改后将直接由主编终审决定。

回应：

谢谢主编和各位编委的几轮意见！经过三轮修改，我们也感到拙作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在最后这一轮的修改中，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1）为尽可能与心理学的写作与表述习惯相吻合，我们遵主编的建议，将原文中“1.2 口述史与集体记忆：心理史与心态史的互嵌”部分调为 1.1，而将原先“1.1 研究对象及选择意义”部分调为 1.2，这样实现了先交代理论背景与研究方法，再讨论研究样本及经验资料来源，接着分析资料、交代研究结果和讨论与结论，现在看来这样的调整是有益的。

（2）在具体的文字表述上，进一步做了修订：其一，欲图使概念及其使用更加符合心理学学科的性质；其二，使得文字表述更加精炼。

（3）为研究和按照学报的编辑需要，增加了若干重要的文献；同时，提及的外国研究者也都增加了英文原名，方便读者查询。

敬告，也谢谢评审专家的建议。

主编 2 意见：

该文已达到学报发表要求，同意发表。